

叙利亚的政治继承与换代

陈双庆

内容提要 叙利亚实行的披着“共和制”外衣的权威主义体制,植根于其既特殊又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在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前总统老阿萨德精心安排下,其次子巴沙尔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子承父业”式的权力交替,并保持了叙政局的基本稳定。然而,在越来越暴露出诸多弊端的现行体制下,潜伏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权力斗争的隐患,加上来自外部的威胁和压力,使巴沙尔政权面临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叙利亚 政治继承 换代 巴沙尔

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¹然而,这一适用于许多国家的论断在叙利亚却似乎并没有得到印证。叙利亚前总统、有“中东雄狮”之称的老阿萨德执政长达30年,并将叙利亚由一个政局动荡、涣散虚弱的国家提升成为政治稳定、社会经济稳步发展、颇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地区强国。然而,在老阿萨德离世及其“强人政治”结束后,他所留下的以权威主义体制为主要特征的政治“遗产”能否被完全继承并保持下去,却成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本文试图对叙利亚政权交接的过程做一总体评估,从一个侧面对中东地区这一特有的、共和制政体的政治“世袭”现象进行剖析,努力揭示其中的“规律”,以期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东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

* 陈双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邮编:100081)

¹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页。

一、老阿萨德的政治遗产

研究叙利亚政治继承和换代问题,无法回避对叙利亚现代政治史上的“特例”——在共和制的“外衣”下实行的权威主义体制及其长治久安之原由的了解。

(一) 权威主义体制产生的背景

“权威主义”源自“权威”一词。“权威”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二是指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威望、地位的人或事物。从政治学角度讲,权威是指对人和规章制度的认可与服从。政治系统中的权威,当其成为制度化的统治方式(统治权力高度集中,民众政治参与明显缺乏)时即称权威主义。¹ 叙利亚权威主义体制的建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合成”:一是原有的议会制因不符合叙国情而遭到失败;二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出现,以及老阿萨德这一传奇式“克里斯玛”(CHRISMA,亦称“魅力型”)人物的成功夺权。

1930年,当时在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开始实行议会民主制。1946年独立后,叙利亚仍延袭了这一脱胎于殖民主义的政治体制。然而,这一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基础的体制并不符合叙利亚传统的社会经济状况,从而一开始便注定了其走向衰亡的命运。

叙利亚拥有一个典型的多元的、“马赛克”式的社会结构。从民族构成来看,分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土库曼人等;以宗教派别划分,则有逊尼派、阿拉维派、德鲁兹派、伊斯玛仪派等伊斯兰教派,以及包括东正教、天主教马龙派在内的基督教教派等。在这些依不同标准划分的社会群体或集团中,部落、氏族、家族等血亲关系起着重要的社会纽带作用。而在历史上,宗教社团的凝聚力甚至超出民族与阶级的认同。正如亨廷顿所说:“在阿拉伯世界里,国家一向软弱无力,它比家庭、宗教团体和统治阶级等还要弱,私利总是高于公益。”^④同时,以大地主、大商人为代表的城市显贵与广大贫困的农民之间的利益对立与冲突也十分突出。因此,宗派矛盾和阶级矛盾构成叙利亚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叙利亚的议会民主制,正是建立在被这一基本矛盾所困扰的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因而难免“水土不服”。具体表现为,形式上为民主、自由选举的议会制仅代表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而处于依附地位、缺乏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的以广大农民为代表的中下层则无法有效地参政。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基础“不相匹配”,自然成为建造在沙漠之上的“象牙塔”。结果,该体制造成议会内各党派权力、利益之争激烈,以

¹ 王彤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④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8页。

军人干政为特征的政变不断,导致政权更迭频繁,最终走向体制的崩溃。

1970年11月,老阿萨德发动名为“纠正运动”的不流血政变。其后,以老阿萨德为首的临时复兴党地区指挥部承诺重建国民议会和全国进步阵线,以及颁布新宪法等,从而启动了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建进程。1971年2月,叙利亚建立了新的国民议会(又称“人民议会”),由复兴党临时委员会任命议员,主要来自党领导机构、军队代表、工会领袖、市民代表及社会名流等。1973年举行了首次议会选举,此后根据《宪法》,每四年搞一次议会选举。1972年3月,建立了新的全国进步阵线(National Progressive),它是复兴党为团结其他政党而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1973年,叙利亚颁布了新《宪法》。

老阿萨德当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是着手对国家政权机构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在加强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增强党和政府在民众中威望的同时,设法缓解执政的复兴党与其他党派组织的政治矛盾。二是对历届政府的过激政策进行“纠偏”,如废除戒严法,放松对新闻及媒体的限制;制定有关保障人民基本权益的新法律,允许国民自由出入境,取消公民在外国银行存款的限制;鼓励侨居国外的叙利亚工程技术人员回国工作;赦免自1949年以来,在一系列政变中流亡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吸收其他政治组织的代表参加政府等。这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刚刚建立的新政权。

(二) 表现形式及主要特征

自老阿萨德执政后,叙利亚就开始推行一党制的“总统共和制”。在1973年新宪法颁布后,进一步确认了叙利亚政治体制为“总统共和制”。根据宪法,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同时兼任军队最高统帅,享有任命副总统、政府总理(也称部长委员会主席)、政府部长(副部长)、军队将领、法院法官等最高权力。总统由全民公投选举产生,任期7年,可连选连任。总统负责向议会提出法案,在议会通过后,由总统宣布生效。从理论上讲,议会可通过表决,以2/3的多数反对票否决总统提出的法律议案,但这种情况在老阿萨德统治下的叙利亚从未发生过。同时,总统也有权解散议会。在议会休会及特殊情况下,总统可根据国家利益需要自行颁布法令。宪法修正案须经议会3/4多数通过和总统批准方可生效。

叙议会称“人民议会”,是国家立法机构,于1971年2月21日成立,议员任期4年。《宪法》对人民议会的职能在原则上做出了规定,其中包括:提名共和国总统人选,通过法律,讨论内阁制定的政策,通过国家预算和发展计划,批准有关国家安全的国际条约和协定,接受议员辞呈,决定大赦以及撤销对内阁成员的信任等。但实际上,人民议会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并不具备立法权,因而仅可起到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

从以上可以看出,叙利亚政治体制是这种“特殊”的一党制的总统共和制。总

统拥有很大权力,包括最高行政权和部分立法权。表面上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彼此之间相互渗透和制约。然而,与叙利亚的现实政治加以对比就不难看出,宪法认定的体制只具有形式上的特征,除了总统拥有的巨大权力属实外,体制的真实权力结构并非如此。从权力结构来看,总统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特征尤为突出。老阿萨德同时兼任复兴党的民族领导机构和叙利亚地区领导机构的总书记,并担任具有象征性的政治协商组织——全国进步阵线的主席,实际权力比宪法赋予的广泛权力还要大得多。

在老阿萨德奠定的家长专制式权威主义体制下,国家权力基础主要由“三大支柱”构成:(1)军事安全机构。它由军队、情报部门、警察宪兵系统等构成,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与老阿萨德有地域、血缘和宗派关系的阿拉维派高级军官集团,控制着最为重要的军事、情报部门及重要的国家机关。二是复兴党的军事机关,多由党内非阿拉维派高级军官组成,也是总统权力圈中的重要成员。三是更为职业化的广大军官构成的集团,一般不介入政治领域,而是通过掌握预算和资源的配置权,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利益集团。军事安全机构在维护国家安全、巩固老阿萨德个人权力、镇压反政府力量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复兴党的组织机构。1973年颁布的叙利亚《宪法》明确规定,复兴党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党。因此,复兴党的纲领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复兴党在叙政权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进行精英选拔和权力调控。在叙利亚,任何一个希望进入国家权力体系的人,无论是文职还是军职都必须是复兴党成员。所有精英的选拔和人才的招募都是由复兴党控制的。可以说,入党是进入权力体系的唯一途径。二是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与其他政党组织相比,复兴党拥有为数更多的党员及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复兴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作用、利益表达和意见汇集机制及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功能,都是其他国家机构难以取代的。三是进行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协助政策实施。依靠强大的组织力量,复兴党在各级国家机构、大中型国有企业和社会群体中,普遍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机构,通过从事任命和政治指导等工作,将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各个具体的社会职能部门,从而加强了政权的政治和社会控制能力。与此同时,党还负责监督行政机关,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反映,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积极分子对群众进行解释、宣传、指导、劝说,使政策得以贯彻落实;(3)行政官僚机构。尽管该机构的实际权力相对较小,但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机关和管理机关,其作用和地位又是不容忽视和取代的。复兴党执政后,随着大型国有企业和部门的建立和发展,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以及社会安全体系的膨胀,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干预和管理日益增强,作为社会公共管理系统的行政官僚机构变得日趋庞大和复杂,重要性也日益增强。除了行使国家具体的行政和社会管理职能外,官僚机构在政治控制和社会整合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

可见,老阿萨德统治下叙利亚政治体制的结构为:以老阿萨德为核心的权力圈,牢牢地占据着权力金字塔的顶峰,而军队、复兴党和官僚机构则构成政权最为重要的三大支柱。总统超越三者之上,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在三者之间进行权力的协调与分配,以维护体制的运作。这一体制的重要特征,就是国家政权对社会的高度和控制,集中表现为:国家有能力使民众服从其要求,参与其领导和控制下的体制,并认可体制的合法性。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国家对社会,特别是社会组织来控制来完成的。

(三)“克里斯玛”式统治特色

老阿萨德政权之所以稳定,“克里斯玛”式统治是其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把政治统治模式划分为传统型、法理型和超凡魅力型三种,老阿萨德统治下的叙利亚即属于最后一种。按照韦伯的说法,“魅力”应该叫做一个人的被视为非凡的品质,即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或素质。¹老阿萨德虽貌似文弱,但内心坚强,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敏锐的洞察力和清醒的历史感,是一位阅历丰富的政治家、驾驭复杂局面的能手、顽强而又极善于抓住时机的谈判高手。美国前总统布什评价老阿萨德是个“政治天才”,卡特赞扬他是“高明的人”。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高级幕僚海卡尔深刻地评论道:“他理解这个世界,并且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和如何干。”一位黎巴嫩著名评论员称:“老阿萨德弱小时不退缩,强大时也不会忘乎所以。”他有钢铁般的决心,信心十足并善于自我控制,孤僻寡言,高深莫测,以至他身边的助手都称其为“斯芬克斯”。^④显然,老阿萨德能够长期稳坐总统宝座,与其个人杰出的才干、过人的胆识、高超的权术谋略、坚韧的意志品质及强烈的民族主义信念等这些个人因素密切相关。当然,老阿萨德之所以能够在12年内从一名普通的空军中尉攀升为国家领袖,并成为阿拉伯世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决非仅凭其“魅力”就可以造就的。按照韦伯的理论,魅力的适用是由被统治者承认决定的,这种承认是由实际的考验作为保障的。^④老阿萨德政权之所以稳固,与其突出的“业绩”,以及由此赢得的民众拥戴密不可分。

在韦伯看来,超凡魅力型统治者的行政管理班子是依据领袖的直觉加以召唤的“亲信”,而非训练有素的“官员”;这些领袖没有“职务辖区”和“权限”,也从不循章行事。^④老阿萨德亲手打造的权力核心圈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自1930年以来,叙利亚的每一部宪法都规定,国家元首必须出自占叙人口主体的逊尼派穆

¹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版,第269页。

^④ [以]摩西·马奥茨:《阿萨德传》,殷罡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④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69、270页。

^④ 同上书,第270、271页。

斯林。因此,隶属阿拉维派的老阿萨德面临既要维护政权合法性,又须得到本派支持的难题。于是,老阿萨德自创了“一明一暗”两个统治集团。一方面,他任命逊尼派穆斯林担任内阁、军队和复兴党内的高级职务,如总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等。另一方面,老阿萨德建立了一个以阿拉维派亲信为主体的“贾马阿”(阿拉伯语意为“集团”),由10多位在安全机构和情报系统担任要职的人组成,被戏称为“十巨头”(大马士革农贸集市上卖的一种名为“大十叶”的莴笋)。¹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从1970年政变时起就是老阿萨德的亲信和忠实支持者,从而形成一个权力“小核心”,实际操纵叙政坛,行使着最高权力。

按照韦伯的说法,任何一种真正的统治关系都包含着一种特定的、最低限度的服从愿望,即从服从中获取(外在的和内在的)利益。^④尽管老阿萨德在位期间、特别是其统治后期,叙利亚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如他本人晚年一样“体弱多病”,引起一些不满。但总体来看,大多数叙利亚人还是感到在现行体制下“得”大于“失”,加上对老阿萨德权威“约定俗成”的认可,从而基本保持了对其统治的“服从愿望”,继而使叙政局基本稳定。

二、老阿萨德对继承问题的考虑和安排

2000年6月老阿萨德病逝后,叙利亚并未出现人们普遍担心的恐慌和动荡局面,而是出人意料地迅速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这一切与老阿萨德生前慎重的考虑和周密的安排密不可分。老阿萨德刚刚离世,叙利亚议会便召开紧急特别会议,将宪法第83条规定的总统候选人年龄从40岁降为34岁,从而使时年34岁的老阿萨德次子巴沙尔得以成为总统候选人,并于当年7月在总统选举中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叙总统。世人多对叙利亚这种“突击任命”式的政权交接方式大跌眼镜,西方学者甚至称之为“制造总统”。^④然而,“制造”巴沙尔这位年轻总统的过程并非人们表面看到的如此一蹴而就。通过对巴沙尔接班过程的梳理,不难探悉到老阿萨德对其身后政权交接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

老阿萨德上台执政时年仅40岁,曾有空军飞行员的经历,身强力壮。而且,因很快在政府主要部门扶植了大批亲信,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树立了个人权威,他的执政基础十分稳固。在此情况下,叙利亚的政治继承和换代问题并不紧迫。直到1983年11月,因心脏病发作并一度处于病危状态,老阿萨德突然意识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必须认真考虑接班人问题了。本来,在老阿萨德

¹ [以]摩西·马奥茨:《阿萨德传》,第61页。

^④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38页。

^④ Flynt Leverett *Inheriting Syria: Bashar's Trial by Fir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 C., 2005, p. 58

手下并非没有继承人入选,例如曾深得其信任、被委以军事情报机构首脑之重任的胞弟里法特和担任第一副总统的哈达姆二人就是他的“左膀右臂”。然而,里法特过早地暴露了问鼎总统权位的野心,特别是在老阿萨德病重期间迫不及待地要取而代之,令老阿萨德极为恼火。于是,他在老阿萨德眼中俨然变成了一个“不稳重、官僚和腐败作风严重的人”,以及“美国人手中的、被用来推翻其兄统治的傀儡”,¹最终被迫长期流亡海外。“里法特事件”促使老阿萨德“觉醒”,意识到指定一个对其构成潜在威胁继承人的危险性,特别是担心在他离世后,会引发那些在军队中位高权重的高官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是他决定不让手下“老臣”继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他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大力培养长子巴西勒,并很快就“初见成效”。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巴西勒因车祸意外死亡,迫使老阿萨德退而求其次,决定栽培名不见经传的次子巴沙尔。

尽管老阿萨德大权在握,但也深知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要取信于民必须依法办事。根据1973年通过的宪法,叙利亚作为一个“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国家,总统应经选举产生,任何指定继承人的做法都是违宪的。因此,老阿萨德明白,若要确保巴沙尔将来顺利登上总统宝座,则必须使他赢得执政的复兴党和军队的支持,以及民众的拥戴。但做到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要想方设法证明巴沙尔具备领导国家的能力。于是,经老阿萨德的精心安排,巴沙尔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他的“资本积累”。在军事方面,他被送到军校学习和深造,逐步解决了“军衔”问题,奠定了其在军队中的地位;内政方面,他被赐予“尚方宝剑”,全权负责治理腐败和信息技术推广;在外交方面,他被委以负责处理最为重要的黎巴嫩事务的重任。同时,老阿萨德借助媒体,对巴沙尔参加各种重要国务活动大肆宣传,还下令四处张贴他的画像,并附上诸如“巴西勒是榜样,巴沙尔是未来”等标语,进一步强化其接班人的形象。此外,为了扫清巴沙尔接班的障碍,老阿萨德还着手将可能对其构成强有力挑战的重要人物陆续排挤出权力中心,其中主要有负责安全事务的副总统里法特、总参谋长谢哈比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统哈达姆等“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不难看出,老阿萨德对巴沙尔确实做到了“扶上马,送一程”,从而保证了他的顺利接班。

三、巴沙尔政权基本稳定的原因

巴沙尔执政以来,政权基本上保持了稳定,这与他审时度势,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巩固政权密切相关。

¹ Eyal Zisser, *Commanding Syria: Bashar al-Assad and the First Years in Power*, I B Tauris & Co Ltd, New York, 2007, p. 27.

方式之一,在对领导层进行有限的更新换代的同时,继续维护元老派的权威。巴沙尔自执政后,开始不遗余力地在叙高层中引进“新面孔”,扶持那些忠诚、务实且“去意识形态化”、与其有共同的世界观、有志于渐进改革的“新卫道士”,替换那些“失去价值”的“老卫道士”。¹为此,巴沙尔精心打造了两个“核心圈”:第一个是以名为“18集团”为代表的“厨房内阁”(含有“非正式”之意),聚拢了来自政府之外的学术和商业界具有广泛国际工作经验的精英,如获得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博士学位、曾长期在世界银行设在伦敦的金融部门供职的纳比勒·苏卡尔,出身高级工程师、以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电子版《时事通讯》的创建者阿卜杜·努尔以及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的利雅德·阿布拉什等。这些人虽不在政府部门供职,但实际上担当了总统私人经济顾问的角色,专门为叙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第二个圈子主要包括巴沙尔亲自任命的政府要员。如旅游部长、曾留学法国的经济学家阿格哈·卡拉;首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博士阿卜杜拉·达达里等。这些与巴沙尔“志同道合”的亲信被安插在重要部门担当重任,无疑有助于改革方略的制定和落实。

除了构建由顾问和支持者组成的“核心圈”外,巴沙尔还在军队和安全机构等“要害部门”委派亲信。例如他的姐夫阿希夫·舒卡特,被任命为叙国内最为重要的安全机构—军事安全局首脑;早期支持巴沙尔继位的卡兹·凯南先后担任“政治安全理事会”(负责监控反政府的有组织政治活动)主席和内政部长。与此同时,巴沙尔也深知,以阿拉维派军官为主的“贾马阿”是其父老阿萨德“钦定”的权力核心圈,也是维持政权稳固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他在“辞退”老一代政府要员方面较为谨慎,并且仍一如既往地倚重“贾马阿”。

方式之二,顺应民众“思变”心理,高调推行改革。在老阿萨德在位期间,巴沙尔就曾受命于其父,在反腐败和推广信息化过程中崭露头角。继任总统后,他公开主张“任何事物和任何人都应该向建设性批评开放”,^④并表示要增加政府工作透明度,继续惩治腐败。由此,在巴沙尔执政初期,由律师、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举办的政治沙龙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他们经常在饭店、咖啡馆等公共场所举行集会,讨论时局并发表政治主张;独具特色的私家报纸获准发行,如以批评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讽刺周报《杜马里报》(AL DOMARI)发行量一度高达每周50000份,超过国家经营的各大报的发行量。^⑤同时,为了密切政府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巴沙尔还要求政府加强与群众对话。2000年8月,他安排3位部长在电

¹ Robert G. Rabl, *Syr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r on Terror in the Middle East*, 2006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p. 191

^④ Sami Moubayed, “Syria's New President Bashar Al-Assad: A Modern-Day Atatürk,” *Washington Report*, Dec. 2000

^⑤ Andrew Hammond, “Slow but Steady Progress in Syria,” *The Middle East*, Dec. 2001.

视台公开讨论政府财政状况,并回答百姓提出的有关工作条件和劳动报酬等问题。对于巴沙尔上台执政后叙利亚出现的变化,西方媒体称之为“大马士革之春”。¹

在就职演说中,巴沙尔承认政府缺乏活力的经济政策是造成国内许多困难的“部分原因”,承诺将通过修改过时的法律法规推进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现代化,扩大对外开放,减少失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对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以推进私有化为主要手段的所谓“休克疗法”不以为然,认为改革只有循序渐进,才能避免对政治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由此,他十分赞赏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更适合叙利亚。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巴沙尔执政后,将解决经济困难作为当务之急,着手逐步推进经济改革,主要措施有:改善投资环境。制定经改计划,修改投资法,调整关税和税收政策,简化进口手续,鼓励外国公司在叙投资兴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旅游等项目;逐步实现经济多元化。在改造国企的同时,推动私企发展,实施国营、私营、合资、集体等多种体制并存政策;推进金融改革。强化央行对外汇的调控能力,统一海关汇率,允许成立私人银行,建立证券市场;实施工业现代化。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工业和旅游业等创汇产业,积极推动信息产业发展,普及计算机使用;解决就业负担。设立专门机构,通过向小型企业和公共事业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增加就业机会;开展“经济外交”,增加对外贸易。加快与欧盟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签订自贸区(FTA)协议谈判进程。通过上述措施,使叙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方式之三,对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采取“宽容”政策。巴沙尔相信这样一句格言:“叙利亚的朋友越多,敌人就越少。”^④为此,他执政伊始,便采取一系列措施缓解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他先是签署总统令,特赦了包括一些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内的数百名政治犯,赢得了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赏。被释放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甚至还专门举行集会,表示对巴沙尔的感谢和支持。^(四)其后,他还特意将曾是潜在竞争对手、被迫“荣归故里”的前任总参谋长希克马特·谢哈比请回大马士革,并授予其“总统府贵宾”的荣誉称号。这一系列举措无形中提升了巴沙尔在民众中的形象。

方式之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坚守政治“底线”,将改革纳入“可控制的”范围内。老阿萨德在位期间,前苏联的解体给了他深刻的教训,即必须冻结可能动摇叙政权根基的任何改变政体的要求。^{1/4}在这方面,巴沙尔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¹ Andrew Hammond “Slow but Steady Progress in Syria” *The Middle East*, Dec. 2001.

^④ Sami Moubayed “Syria’s New President Bashar AL-Assad A Modern-Day Atatürk,” *Washington Report*, Dec. 2000

^(四) Ibid.

^{1/4} Eyal Zisser, *Commanding Syria: Bashar al-Assad and the First Years in Power*, I B Tauris & Co Ltd, New York, 2007, p. 15

即更关心能否保持国内局势稳定,而不愿将宝押在“未经过检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上。¹ 因此,巴沙尔在大张旗鼓地倡导改革的同时,也为之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即指“叙利亚人民、复兴党、国家统一、武装力量和已故总统的遗产”。^④ 换言之,巴沙尔领导下的现政权绝不允许任何政治组织或个人以任何方式危害人民的利益,动摇复兴党的领导地位,威胁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挑战军队的权威或否定老阿萨德的历史功绩。在舆论方面,巴沙尔明确拒绝在叙“移植”西方式的民主,呼吁建设具有叙利亚特色的民主。具体而言,就是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和文明,适合叙利亚的社会和现实需要的民主。由此,在“大马士革之春”出现一些负面影响后,巴沙尔政府明显加强了管控措施,如要求各政治沙龙在活动前必须提交参加者和发言者名单以及主题发言的副本,责令有关部门对一些主张改革的活跃分子进行“问话”。甚至对一些发表“过激言论”的人进行拘捕或判刑。例如,叙共产党领导人里亚德·图尔克公开抨击老阿萨德是“独裁者”,指责他依靠“恐怖和掠夺人民财产”维持政权,指出“叙利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陷于停滞,而一些人却称之为稳定”。^④ 他甚至指责老阿萨德对其子接班的安排“已经把叙利亚转变成他的家庭私有财产,并使国家成了一个大监狱”。^½ 显然,这些触及“红线”的激进言论将矛头直指叙政治体制和复兴党执政的合法性,威胁到巴沙尔的执政地位,令其无法接受。

方式之五,在外交领域,巴沙尔更是坚定不移地贯彻老阿萨德的外交路线,努力维护叙利亚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埃及和约旦先后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巴勒斯坦方面也与以开始和谈之后,叙利亚仍坚持反以立场,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更为突出。对叙利亚来说,高举反西方和反以色列大旗、全部收复戈兰高地是其外交政策的“支柱”,不可动摇。长期以来,老阿萨德正是高举这两面旗帜,对内加强凝聚力,对外调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叙在中东的影响力长久不衰。因此,巴沙尔在阿以问题上完全遵行其父的政策,明确表示叙利亚“虽然渴望和平,但不想放弃一寸土地”,强调收复戈兰高地“是首要任务”。

此外,巴沙尔本人具备作为领导者相当的个人素质,以及不同于其父的、崭新的领导风格,如忠实、勤勉、机智、开明、精力旺盛且充满活力等,^½ 也为其处理错综复杂的国内外事务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巴沙尔与其父的一大不同点,

¹ Robert G. Rabil, *Syr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r on Terror in the Middle East*, 2006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p. 195

^④ Andrew Hammond, “Slow but Steady Progress in Syria,” *The Middle East*, Dec. 2001

^④ Sami Moubayed, “The Wall of Fear Crumbles,” *The Middle East*, Jan. 2002

^½ Eyal Zisser, *Commanding Syria: Bashar al-Assad and the First Years in Power*, I B Tauris & Co Ltd New York, 2007, p. 43

^½ Ibid., p. 50

便是颇具“亲民作风”。他时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有时，他亲自开车在大马士革考察，后面仅有两部负责安全的车辆跟从，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在路口遇到红灯就停车等候。他还与私人朋友们在普通饭店里聚餐，并在仅有两名保镖随从的情况下到清真寺参加周五的穆斯林“主麻日”（集体礼拜）。这与当年老阿萨德出行时，途经道路戒严，与包括十几辆包括救护车和探雷车在内的“总统车队”护送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无疑，巴沙尔“不同凡响”的表现为之在民众中的威信“加分”。

巴沙尔执政 10 年来，叙利亚基本上完成了从“克里斯玛”式统治向“凡人统治”的过渡。特别是经过 2007 年全民投票选举，巴沙尔获得 97% 的选票（投票率为 75%），¹ 总统地位相对稳定。

四、巴沙尔面临的挑战

对于巴沙尔来说，要想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然而，叙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弊端的积重难返，从国际到地区形势的变幻莫测，加上内忧外患，无不对其治国韬略和执政能力构成严峻考验。

首先，对巴沙尔政权来说，推动改革最大的羁绊，莫过于内部体制弊端的积重难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政治体制不成熟和决策机制的不健全，使改革举步维艰。在老阿萨德权威主义体制下，他个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对重大事务拥有最终决策权，使得叙利亚的政治机构，如全国进步阵线、部长委员会和人民议会等均形同虚设。与此同时，政府也从未设置诸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经济顾问委员会或管理预算办公室等行政决策机构。这种真正的现代行政能力的缺乏，成为继任者进行主动、大胆决策的羁绊。例如，尽管老阿萨德也曾任命一些经济领域的专家主管重要的经济部门（如经济部部长穆罕默德·艾马迪），但他们却不得不在复兴党制定的政策指导框架中进行运作，同时还必须照顾到各部门和权重人物的利益，从而往往难以形成、更无法落实一以贯之的改革计划。巴沙尔对父亲留下的这一权力结构的局限性心知肚明。他在 2004 年 1 月的一次访谈中坦言，在现存的总统制或更为广泛的官僚结构下，他对在许多重要领域采取严肃认真的改革措施感到无能为力。^④

其二，老阿萨德造就的“个人化的继承机制”对巴沙尔形成束缚。在 1984 年老阿萨德的胞弟里法特准备篡权的事件发生后，他就断定不可指定一个对其自身

¹ David W. Lesch, “The Evolution of Bashar al-Assad” *Middle East Policy* Summer 2010 p. 77.

^④ Flynt Leverett *Inheriting Syria: Bashar's Trial by Fir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 C., 2005, p. 28.

权力地位构成威胁的人为继承人。此外,他还担心指定继承人会促使军方一些掌握军权的人不但不维护最高领导层的权威,反而陷入权力斗争的旋涡。老阿萨德在其执政的最后10年期间,越来越倾向于将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儿子,以确保了其继承者将成为“老阿萨德光辉的捍卫者”,而不是以一个大胆的改革者的面目出现。这一做法虽避免了大权旁落,但也导致继承者难以制定与既定方针明显不符的、一以贯之的政策。巴沙尔的一名政治顾问指出,维护“老阿萨德遗产”成为巴沙尔的“历史性任务”,对推进改革进程的束缚甚至超过来自“老卫道士们”的阻挠。¹

其三,尽管身为老阿萨德指定的接班人,巴沙尔在老阿萨德家族中的地位也并不稳固,面临潜在的威胁和挑战。就在巴沙尔出任叙总统后,他的叔叔、流亡西班牙的里法特通过卫星电视发表评论,对巴沙尔接班形式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强烈抨击此举是“在叙利亚宪法的背上捅了一刀,意味着总统制合法性的终结”。^④此后,据称里法特还试图与流亡英国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化敌为友”,共同探讨建立由里法特领导的联盟、谋求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可能性。他的姐姐布什拉和担任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首脑的姐夫舒卡特的政治野心路人皆知,素有“大马士革的强力夫妇”之称。他的弟弟马希尔因贪污腐败越来越声名狼藉。还有,他的叔伯兄弟等亲戚都不同程度地涉嫌贪赃枉法。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巴沙尔改革进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特别是一旦实行加强管理的透明度和打破行业垄断等政策,将很可能会损害其家族成员的经济利益,从而对改革的深入“投鼠忌器”。

其四,作为老阿萨德的继承人,年轻的巴沙尔还受到父亲留下的“核心圈”内元老派及其亲信的制约。叙利亚的总统制起初就是为加强老阿萨德总统地位和作用建立起来的。经过长期发展和完善,不但体制本身更加行之有效,而且老阿萨德的总统特权已经普遍为广大政治精英所接受。在这个以老阿萨德个人权威为基础的体制下,任何一个继承人,不管他是否来自“核心圈”或家族内部,如果与老阿萨德的个人权威和执政能力相去甚远,形成“权威落差”,便不可能完全取而代之。况且,尽管老阿萨德当年曾撤换过一批元老级人物,但还是留下了现任副总统沙雷等“忠臣”辅佐巴沙尔,并为巴沙尔顺利接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这些出自“核心圈”的“老臣”仍在军队、情报机构和国家安全部门中掌握很大权力,且作为既得利益者,大多反对任何变革。面对这些权高位重的“叔叔辈”部下,巴沙尔在决策时自然不敢怠慢,从而对新的内政、外交政策出台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同时,巴沙尔培植的新生代领导人羽翼未丰,尚无力与“老卫道士”们分庭抗礼。据巴沙尔一名顾问透露,自老阿萨德去世后,叙内阁大概更换了6名新成员。然而,这些代表

¹ Flynt Leverett *Inheriting Syria: Bashar's Trial by Fir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 C., 2005, p. 28

^④ Eyal Zisser, *Commanding Syria: Bashar al-Assad and the First Years in Power*, I B Tauris & Co Ltd, New York, 2007, p. 42

“新思想”的领导人处于数量多得多的老资格部长们的包围之中，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¹

再者，深化经济改革仍面临重重困难也是对巴沙尔的严峻考验。叙利亚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大多国企面临管理落后、设备陈旧、效率低下、产品积压、亏损严重等困难；金融、税收体制严重滞后，私企几乎未得到过贷款，企业所得税率高达 25%，造成企业逃税现象严重；政府部门腐败，工作效率低下，官僚作风等问题积重难返。此外，叙政权内部高层对经济改革分歧较大，推行新政策面临阻力，加之受持续动荡的地区形势影响，经济增长严重受限。

其次，叙国内蛰伏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库尔德反叛分子等也对巴沙尔政权和叙利亚的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1982年，老阿萨德曾强力镇压了位于叙中西部哈马城的“伊斯兰起义”，从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在老阿萨德去世后，一些城中的居民对外国记者称：“老阿萨德自然死亡真是太糟糕了，他本应为他在这座城市犯下的罪行受到惩罚。”^④叙利亚约有 150 万库尔德人，占人口总数的 10%，是叙利亚最大的少数民族。叙政府对库尔德人的自治要求一贯坚决拒绝。2004 年 3 月 12 日，在叙北部城市卡米什利发生球迷骚乱事件，造成 9 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第二天，数百名库尔德人为 3 名死者举行葬礼，与当地阿拉伯人再度发生冲突，至少造成 1 人死亡。其后，西方国家政府和舆论借机攻击叙政府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政策，并大肆渲染骚乱的政治属性。

第三，流亡海外的叙反对派纷纷组织力量，谋求有朝一日推翻巴沙尔政权。2003 年下旬，一个名为“叙利亚改革党”的反对党在美国华盛顿宣告成立。该党创始人是美籍叙利亚商人福里德·纳希德·加德里。2004 年 1 月，该党在布鲁塞尔召集所有流亡海外的叙利亚反对党开会，试图筹划建立一个与叙复兴党政权相抗衡的“民主联盟”。2005 年 3 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一些流亡欧美的叙反对派代表开会讨论为叙利亚政府构建一个民主体制的可能性。此前，另一名美籍叙利亚商人沙哈比·穆夫拉特在华盛顿宣布成立又一个名为“民主觉醒党”的反对党。^④其后，流亡法国巴黎的原第一副总统哈达姆也扬言要推翻巴沙尔政权。2005 年年底，他公开指责巴沙尔涉嫌、或至少对暗杀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一案负有责任，并与叙流亡在外的穆斯林兄弟会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反政府联盟，发起要求叙政府实施多党选举等政治改革运动。^④

¹ Flynt Leverett *Inheriting Syria: Bashar's Trial by Fir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 C., 2005, p. 30

^④ Eyal Zisser, *Commanding Syria: Bashar al Assad and the First Years in Power*, I B Tauris & Co Ltd, New York, 2007, p. 43

^④ Ibid., p. 96

^④ Bany Rubin, *The Truth about Syria*,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07, p. 171

此外,在“9·11”事件、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叙利亚的地缘政治环境明显恶化。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成为叙政府头上的两柄“达摩克利斯剑”。“9·11”事件后,叙利亚虽未被美国列为“邪恶轴心”,但一直在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榜上有名。特别是叙利亚长期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直接干扰美国在中东发动的反恐战争,令美十分恼火。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不断指责叙利亚背后为伊境内的反美武装提供支持,不仅窝藏扎卡维等恐怖分子头目,而且默许、甚至纵容恐怖分子穿越叙伊边境,直接威胁驻伊美军安全。此外,叙控制并操纵黎巴嫩政府,阻挠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也是其“罪名”之一。于是,美国对叙利亚一直虎视眈眈,不时通过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甚至武力威胁甚至等手段“敲打”叙利亚。2004年12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经由美国国会批准的《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以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拒绝撤出驻黎巴嫩叙军部队等“罪名”,宣布对叙实施经济制裁,内容包括禁止向叙出口除食品与药品之外的商品,冻结叙利亚在美国的资产,禁止叙民航飞机进入美国领空,限制美国与叙利亚之间的银行业务往来等。2005年2月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后,美国指责叙高官涉嫌此案,召回了驻叙大使,并迫使叙撤出其驻扎黎巴嫩的军队。2008年10月26日,四架美国直升机从伊拉克进入叙利亚境内,针对“威胁驻伊美军的恐怖分子”发动突袭,造成8人死亡。对以色列而言,叙利亚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反以斗争的支持使之如“芒刺在身”。鉴于此,以色列不但一直密切注视着叙利亚的一举一动,而且从未放松对叙施加压力,甚至随时做好开战的准备。流亡在大马士革的哈马斯政治局主席马沙尔被以称为“遥控恐怖活动”的头目,早已被锁定为打击目标。2004年,一位以色列部长曾声称,一旦时机成熟,“以色列的导弹就会毫不犹豫地打向大马士革”。2007年4月27日,因俄罗斯向叙利亚提供新型武器,以方担心叙会铤而走险,卷入以与黎真主党的武装冲突。于是,以军动用上百辆坦克、上千名官兵和数十架战机,举行了针对叙利亚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紧接着,以军又在国防部长巴拉克亲自指挥下,于4月30日在戈兰高地举行了军事演习。2007年9月6日,以色列空军越境炸毁了叙利亚的一座疑似核设施的建筑物。可以预见,只要叙利亚继续沿袭现行体制和政策,未来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仍会将叙利亚视为“眼中钉”。因此,如何应对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无疑对巴沙尔构成严峻挑战。

总之,尽管现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仍属于年轻一代领导人,且执政日本来保持了叙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然而实际上,叙利亚就像表面风平浪静的大海,“内忧”与“外患”如深藏于海底的暗流不断涌动,加上包括突发事件在内(如其兄巴西勒因车祸身亡)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均给这个具有特殊政体的国家未来的政治继承与换代问题埋下很多“悬念”。

characteristics. The Arabian Peninsula's local political forces are allied with Wahhabism. It is a state built on Islam. The Peninsula is on the margin of world civilizations. The country has a unique religious regional position. It has lagged behind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ts economic progress is bound to huge petro-dollars. The economic takeoff has consolidated the Kingdom's legitimacy. However, the Saudi House has not dealt properly with the issue of succession. The succession issue is a serious challenge that the Kingdom must meet.

On Political Succession Of The Syrian

Leadership *Chen Shuangqing* (101)

Syria's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 under the guise of a republican system, has roots in its unique and complex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Under the arrangements of the former Syrian president Hafez al-Assad, who was in charge of the Ba'ath Party,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army, his second son Bashar al-Assad's takeover of the presidency was not only smooth, but also successfully maintained the basic stability of the Syrian political situation.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abuses 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system, and hidden troubles such as underlying conflicts and struggles for power, and along with threats and pressures from abroad, Bashar's presidency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Public Diplomacy: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Wu Baiyi* (115)

China is an emerging great power, and it is only through reform and innovation can China's foreign policy continually utilize its great capacity and eliminate resistance to its advancement in order to grasp greater opportunities and expand room for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transform and use the traditional thoughts in its ideology to construct and spread its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doctr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values,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goals of the public foreign policy, planning, layout of power participation, and instruments and skills and tools, and to elevate China's level of public diplomacy.

The Identification of East Asian States in the Era of Dynastic Changes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Li Yangfan* (126)

The disintegration of China's tributary system during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may have looked like the result of impact from the West. Yet there actually were internal causes of its collap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and status, the main states of East Asia, whether in their